

重庆长寿巨梁沱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杨华 余菀莹¹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巨梁沱遗址位于三峡库区长寿区江南街道龙山社区八组至巨梁沱村五组的长江边上。2017年度在该遗址处发掘时,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制作露天加工场。此处石器加工场的地形是一由后山坡逐渐向长江延伸而凸起的一山嘴,在这处石器加工场发现有大量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此次发掘共清理石制品、陶器、瓷器标本多达 1519 件,另外还有完整的动物遗骸 360 余件。该石器加工场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实物资料。像这样的石制品数量如此之多,且种类十分丰富的遗址,过去在三峡考古发掘中是不见的。

【关键词】: 长寿 巨梁沱遗址 A 区 B 区 石制品 加工场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8)02—0029—07

一、遗址概况及发掘经过

巨梁沱遗址位于长寿区江南街道龙山社区八组至巨(锯)梁沱村五组长江边的第二级阶地边缘地带,东边是长江,西北距长寿区江南街道约 4000 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 4′ 55.58″,北纬 29° 47′ 3.04″,海拔高 165~180 米。这一地带地理环境特殊,长江由西南方向的巴南区流经长寿区后,因受两侧山地的影响和制约,水流继续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经长寿老城区,然后再向东南滚滚而去,长江在这一地带呈“几”字形特意向北凸出。

从实地调查和勘探情况看,所谓巨梁沱遗址,其分布范围大致从西北边的龙山社区八组经东南方向的巨梁沱村五组全长约 5 千米长江边的缓坡及河漫滩上。多处地点都可采集到商周及汉代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遗物,包括有石器、陶片、瓷片等,另外还有一些汉至六朝时期的墓砖,尤其是被当地村民称谓的几处小地名,如曾碛沱、大堡码头、斗篷顶、袁家沱、将军滩、大沙坝、芭蕉沱等地点,古文化遗物相对较多,有的地点还发现有文化层,但破坏严重,也有的被厚达 3~4 米的长江洪水过后的淤泥(沙)覆盖。

该遗址之所以被列入 2017 年度重庆库区淹没区的发掘项目之一,是因为此前的 2008 年,湖南省的文物工作者曾在这一地带将军滩地点发掘过,受发掘面积的限制,2008 年度仅发掘 1000 平方米,当年度在该遗址发掘出了一大批商周至唐宋时期的各类遗物。鉴于这一地带古文化遗存丰富,过去在长寿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故受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委托,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共同承担了 2017 年度三峡库区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项目之一的长寿巨梁沱遗址 800 平方米的发掘任务。考古队于 2017 年 5 月 6 日进场,2017 年 7 月 10 日结束田野考古工作,随即转入室内整理。

在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龙山社区八组的曾碛沱地点和巨梁沱村一组的袁家沱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为了便于区

¹**作者简介:** 杨华(1955—),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巴蜀文化考古、三峡地区考古、西南地区考古文化研究。

余菀莹(1993—),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三峡地区和巴文化考古文化研究。

分,我们又将这两个发掘区分别编为A区和B区(曾碛沱地点为A区,袁家沱地点为B区)。现将A、B两个发掘区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A区位于龙山社区八组的长江边上,地形是一由后山坡逐渐向长江延伸而凸起的一山嘴(当地村民称曾碛沱)。山嘴(脊)前缘有较平缓的坡地,面积约300平方米,由坡地前缘(河坝)斜向而下是一条向长江侈出形似巨龙的石梁,该石梁长约50米。山嘴南侧是高约20~30米的断崖,崖脚是一自西向东的自然冲沟,山嘴北侧是一由南向北呈倾斜状的坡地,古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嘴处的坡地及北侧斜坡地段。经勘探获知,该发掘区文化遗存现存面积约1200平方米,在山嘴的坡地及北侧斜坡上发现有成堆的河卵石以及大量石制品(包括有少许呈块状大小不一的砂岩),表层中多有汉代板瓦(片)、筒瓦(片)、墓砖等夹杂在一起,遗址地表到处都是河卵石及一些加工过的断块、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物。从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层来看,东部区域基本上都是制造石器的河卵石堆积,最厚的堆积可达3米多,而西部区域河卵石堆积远不如东部区域;尤其是最西边的区域,主要是汉代文化堆积,没有发现河卵石和石制品堆积。在A区共布10×10米探方10个,布方编号顺序是根据地势及文化分布情况,由东向西而布,探方编号分别为:2017CJAT1~2017CJAT10。受发掘面积和时间限制,又考虑到在B区布了3个探方正在发掘中,故在A区共发掘5个探方,发掘的这几个探方都在该遗址的西部,探方编号依次是:2017CJAT5、2017CJAT6、2017CJAT7、2017CJAT8、2017CJAT10。发掘的这5个探方的地层堆积情况是:2017CJAT5、2017CJAT6主要为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层,重点收集石制品的相关资料;2017CJAT7、2017CJAT8主要为汉代文化堆积层,并夹杂有极少商周时期的陶片及打制和磨制石器,将为我们了解该遗址汉代文化遗存的资料情况提供帮助;2017CJAT10北边与2017CJAT6为邻,本方的发掘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的地层叠压关系,二是清理南边河坎处地层堆积中的动物遗骸。为解剖该遗址的河卵石及石制品所处时代至关重要。

B区位于巨梁沱村一组长江边的缓坡及河滩处,属于长江第一级阶地与第二级阶地的交汇地带(当地村民称为袁家沱),北与A区相距约1500米,遗址南侧是一自西向东的自然冲沟,遗址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发掘前调查时在这一地带的阶地及江江河漫滩上发现有一些石器、商周及汉代的陶片、板瓦(块)、筒瓦(块)、墓砖等。另还发现有一些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青瓷片。在靠西边的河坎的断面上发现有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包含物有绳纹陶片、草木灰、红烧土粒等。经钻探可知,靠西边河坎处上面的阶地,古代文化层堆积最厚可达2米多,但包含物不是很丰富,而东边即河坎下缓坡地带的文化层堆积基本上已被历年来(尤其是近20年)的长江洪水冲掉,仅局部发现有残存的文化遗存。在B区共布10×10米探方3个,据文化层堆积的分布情况,我们采取了错位布方,探方编号(由北向南)依次是:2017CJBT1、2017CJBT2、2017CJBT3。B区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另有少许汉代文化堆积。在遗址西边约40米的缓坡地带发现有汉代墓葬,但该墓葬早在20年前就被当地居民的开荒挖掘毁掉了,仅存一些散落在地面的残墓砖。

二、地层堆积及文化遗迹

(一)地层堆积

本年度巨梁沱遗址的两个发掘区地层堆积不同,文化内涵虽说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异。现将A、B两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及发现的文化遗迹资料情况简述如下。

A区主要是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层,厚30~100厘米不等,以T5、T6及T10为例,清理完表层杂草、根茎、树木及少许淤沙土以外,基本上都是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有的直接暴露在外,文化堆积皆由南(高处)向北(低处)呈斜坡状堆积而成,坡度大约在20°。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层下为砂岩,T7、T8的坡势更陡些,大约在25°左右。该发掘区的古文化遗存的堆积可分为3层;靠南边(高处)的地层堆积较薄,靠北边(低处)的地层堆积较厚,北端文化层最厚的可达120厘米。T10分布于A区发掘的最高处(T6的南边),本方的南部处于河坎上,北部处在河坎下的缓坡地带,南部的河坎处基本上无文化遗存,但从动物考古学方面我们清理(筛选)出了1000余件古动物标本,为本次发掘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因受发掘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加之古文化层堆积的内容不同,故本发掘区的几个探方地层堆积并非一样,如前言及,T5、T6及T10的北部的地层堆积情况基本相同,绝大部分河卵石及石制品都裸露在外,经对T6南部及T10北部的清理,理清了河卵石及石制品所在层位与上、下层堆积的层位叠压关系,T7、T8两探方的地

层堆积基本可以对应,只是文化层堆积厚薄不均而已。A区的地层堆积资料将以T6、T10和T8为例说明,B区的地层堆积资料将以T3为例说明。

2017CJAT6、2017CJAT10

第1层:银灰色淤沙层,皆为三峡水库蓄水后淤积而成,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须及杂草。该层仅靠本方南部河坎上的T10有此层,靠北部河坎下的T6无此层。厚30~50厘米。

第2层:扰乱层,浅黄色沙土层。土质较疏松,内夹杂一些砂石块,灰陶瓦片、墓砖,零星陶片、瓷片等。在北部河坎下的缓坡上分布有较多的石制品、陶片等,另还发现有一件磨制石器。厚25~100厘米。

第3层: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层。本层主要是河卵石及石制品堆积层,北部T6有此层,南部T10少许,石制品主要出土于本层的上部,种类主要有石核、砍砸器、石片、刮削器等,另还有一些断块,基本上都是石坯,成形器很少,厚约50厘米。

第4层:浅黄色沙土层。土质较疏松,内夹杂有一些砂石块,该层主要分布于河坎上的T10内,本层中出土有较多的螺蛳壳。厚25~100厘米。

2017CJAT8

第1层:表土层,灰褐色土,为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洪水淤积而成,土质疏松。包含物有石制品、陶片、红烧土粒、铁钉、瓷片、玻璃碎片等。主要分布于本方的北部,南部靠南壁处为河坎,坡状堆积,部分地方底部露出料礓石。厚约20厘米。

第2a层:洪水淤积层,红黄色土。为三峡库区蓄水后淤积而成,土质疏松,含有腐殖质、植物根系、瓦片、青瓷片、石器等。主要分布于本方的北部,坡状堆积。厚25厘米。

第2b层:洪水淤积层,灰褐色土。为三峡库区蓄水后淤积而成,土质疏松,包含物与第2a层基本一样,主要分布于本方的北部,呈斜坡状堆积。厚30厘米。

第3层:汉代文化层,灰黄色土。土质疏松,主要分布于本方的中部,本层包含物较多,出土有较多的陶片和石器,器形主要有盆、罐、钵、甑等,另还有相当数量的板瓦(片)和筒瓦(片),厚20厘米。本层下发现一灰坑,编号2017CJAH1。

2017CJBT3

第1层:表土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夹杂大量植物根系,厚15~30厘米。该层下叠压有一现代扰乱坑,开口在第1层下,打破第2层和第3层,坑口直径275、深180厘米。

第2层:近现代扰乱层,黄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有一些炭粒、草木灰、红烧土。出土有陶片、青灰砖、瓷片、釉陶(缸胎)片、玻璃碎片等。厚20~80厘米。

第3层:商周文化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含有零星灰烬、红烧土颗粒。出土陶器能辨别出器形的主要有圈足器、罐口沿、残豆柄等,另还有石斧、网坠、砍砸器、石片等。厚115~190厘米。

据巨梁沱A、B两个发掘区地层堆积的土质土色以及各层位中的出土遗物情况,可将A、B两个发掘区文化遗存分为旧石器时

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商周时期、汉代和明清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存主要以 A 区的 T1~T6、T9、T10 为代表。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在 A、B 两个发掘区都有发现,但 A 区破坏严重,仅只有零星的文化堆积及散落在遗址处地面的陶片,B 区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主要以 T3 的第 3 层为代表,厚度近 200 厘米,但包含物不是很丰富。汉代文化遗存主要以 A 区 T8 第 3 层为代表,厚约 70 厘米,出土遗物较丰富,另在 A 区各探方中都发现有汉代遗物,尤以板瓦(片)、筒瓦(片)为最,亦为冲击而成。明清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近现代文化堆积层中。

(二) 遗迹

在 A 区仅发现灰坑 1 个。编号 2017CJAH1。该坑位于 A 区 T8 内的中部偏东,距北隔梁 390 厘米,距东隔梁 310 厘米。开口在第 3 层下,打破生土。因 A 区整个发掘区的地形都是南部高、北部低,故本次发掘的几个探方的地层堆积皆是由南向北(长江)呈斜的坡状堆积,H1 也是一样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坡度 20°。该坑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口略大于底部,坑壁较明显;坑底较平缓。坑内填灰褐色黏土,质地较硬,夹杂有料礞石、砾石,坑口南北长 185、东西宽 110、深 20 厘米。

三、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共 1519 件。其中石制品 712 件、陶器 305 件(片)、瓷器 5 件,另外还有完整的动物遗骸 360 余件(个)。石制品类主要有断块、石坯;另还有生产工具和捕鱼工具;陶器类主要有生活用具和建筑材料;瓷器类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器。

(一) 石制品

石制品是本年度发掘的数量最多的一类,内容也很丰富。本次只重点清理了 2017CJAT6,因该探方石制品很多,时代偏早,故我们将另文介绍。这里我们只对其他各个探方中出土的石制品来进行介绍。在 A 区、B 区几个探方中共清理出石制品 142 件,包括有铈、斧、砍砸器、刮削器、网坠、石核、石片、断块、石坯等。

(二) 陶器

在 A 区、B 区都有出土,但数量不多,主要分为商周和汉代。

(1) 商周时期。陶器数量很少,基本上都是陶器残片,仅几件能看出器形,无法复原。发现的陶器残片几乎全部为夹砂陶,个别为泥质陶,但在夹砂陶中又有夹细砂和夹粗砂之分,以前者居多,后者较少。陶色有红褐陶、灰褐陶、褐陶、灰陶、黑皮陶等。多数为素面,少数器表外有纹饰,纹样主要有绳纹、菱格纹、篮纹、划纹、弦纹、戳印纹等。器物主要有平底器 3 件、圈足器 2 件、钵 1 件。陶器制作,基本上都是轮制。

(2) 汉代。陶器数量较多,共出土近 300 片陶片,但能复原者较少。共挑出标本 25 件,主要是生活用具和建筑材料。多泥质陶,夹砂陶少许,在夹砂陶中又有夹细砂和夹粗砂之分。陶色有灰陶、灰褐陶、褐陶、黄褐陶、黄皮陶等。陶器约有 60%以上为素面,其余 40%有纹饰的陶器中,绳纹最多,另有方格纹、弦纹、篚带纹。器物主要有盆 3 件、钵 3 件、壶 1 件、罐 2 件、甑 1 件、圈足碗 1 件、器垫 1 件,另还有砖 3 件、板瓦片 5 件、筒瓦片 4 件、瓦当 1 件。陶器的制作,基本上都是轮制。

(三) 瓷器与釉陶

遗物不多,大多是生活用品,均出土于第 2 层(近现代扰乱层)中,共挑选标本 5 件,其中瓷碗 3 件、瓷盏 1 件、釉陶盆 1 件。

四、结语

本年度对重庆库区长寿巨梁沱遗址一带的调查以及 A 区和 B 区的发掘,使我们对长寿区长江南岸自西北龙山社区八组沿长江往东南至巨梁沱村五组,全长约 3000 多米地段古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尤其是对 A 区所谓河卵石与石制品文化堆积层的发掘,令我们深感困惑的是,该遗址处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河卵石?现清理出了石制品标本多达 700 余件(仅清理了表层),以及还有 600 多平方米的面积未发掘的地层堆积中,必然还会有更多的石制品出土,指示我们当时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生产和加工石器的空前繁荣时期。下面拟就本次调查与发掘的资料情况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们的初略认识与收获。

1. 遗址的堆积形成与海拔高程。该遗址东边靠河坝边缘堆积厚达 3 米多,基本上都是冲击(搬运)而成,靠后边的堆积为原生堆积,但因为遗址所处地为一缓坡(斜坡)地带,坡度在 20~25 度之间,故堆积层上部多应该是搬运堆积。自三峡大坝蓄水 20 多年来,该遗址每年都遭到长江洪水的冲击,故该遗址地层的上部应该是水流搬运堆积。以该遗址现在所处海拔高程为 165~183 米之间的位置来看,较以往这一地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先秦时期人类居住遗址位置要稍高一些,如与长寿为邻的涪陵、丰都长江沿岸发掘的 14 处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海拔高程一般都在 140~175 米之间。175 米以上的只有 3 处。^[1]又如这一地带先秦时期人类居住的遗址如丰都石地坝(155~175 米)、观石滩(167 米)、沙溪嘴(157~175 米)、黄柳嘴(155 米)、秦家院子(148~152 米)、石柱观音寺(151 米)、沙湾(140~165 米)等遗址,海拔高程多在 150~175 米之间,175 米以上的较少。由此可见,该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对较高。

2. 堆积中河卵石个体大小情况。本年度 A 区发掘的这处遗址,河卵石可谓是堆积如山,据清理的 T6 获知,堆积厚达 80~100 厘米。这些河卵石个体大小比较均匀,既没有较大河卵石,也没有较小河卵石,基本上都是一般人力可以搬运且磨圆度较高、石质较硬的河卵石。我们怀疑,这些个体大小比较均匀的河卵石有可能是有意识挑选过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此之多的河卵石搬运工作任务之大,所需搬运人员之多,实在是难以想象。

3. 原料的来源。据调查,这一地带长江河床及河漫滩上,有着丰富的河卵石原料资源,至今仍有施工单位在这一地带河床上用挖掘机挖取石料用于建筑。这些天然的石料不仅用于建筑部门,而且也曾经是三峡地区石器时代原始人们制作生产工具的最佳原料。考古工作者发现,三峡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制品(石器),其原料多来自于长江河漫滩上的砾石,即便是夏商周时期劳动人们使用的石器原料同样也是就地取材,来源长江河漫滩上。由此我们不妨推测,该遗址处的这些石料是不是也来自于长江河漫滩上?但问题是,如前言及,该遗址所在地海拔相对较高,其垂直高度距河漫滩石料采集点至少 40 多米高,从遗址处到河漫滩上去采集石料,其间距离至少在 100 米以上,甚至更远,况且还是上坡。所以,将如此之多的河卵石从长江河漫滩上搬运到现在遗址处恐怕不太现实。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距遗址处 T8 平行往西去约 30 米处的区域是有着大量堆积如山的河卵石堆积层,宽度 20~30 米,厚度达 10 多米以上,河卵石堆积当是遥远的古代长江搬运冲击或是河床改道等堆积形成的,从这里搬运石料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省力的。不过,即便是选择在该遗址的西边搬运这些石料,其搬运所需要的劳力也是非常惊人的。或许是几代、十几代人努力的杰作。

4. 石制品与河卵石。在该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制品。种类主要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另还有大量的断块,石制品有一次加工的,也有二次加工的,以前者为主,后者少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发掘现场对石制品的拼对发现河卵石中由 2 块、3 块、4 块,最多的还有 6 块、7 块拼对复原的。这些河卵石的摔(打)击石片或者剥裂的大小石块有的在附近找到,有的竟然在好几米外的其他探方中发现,经拼对复原的河卵石多达五、六十件。这在过去三峡地区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是不见的。

5. 遗址的性质。前已介绍,该遗址的地层堆积较厚,文化内容也较丰富,既有成堆的河卵石,也有数量很多的石制品。在发现的石制品中,断块数量最多,其次是石片。至于说为什么断块数量很多,这也主要是因为该遗址处拥有着丰富的石料资源,从而导致古人类对石料开采和利用的浪费。发现的石片很多,但多形状不一,没有一定规则,大、中、小型都有,有完整的,也有不完整的,大多数石片背面为自然面,腹面的放射线比较清楚,同时我们还发现有少许可能是打片和修理石器产生的片状和碎屑,疑是对石制品生产加工遗弃的。就本年度调查和已清理的石制品数量而言,可以推测,整个遗址范围内估计有数万件,甚至 10 万件以上。数字如此之庞大,可想而知,当时在这里从事石制品生产加工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具有一定规模。据发掘出的一些石制品与河卵石(砾石)伴生,但腐蚀程度不高,尤其是在发掘现场还拼对复原了一些石制品现象来分析,石制品本身就埋藏在原地,没有经水流

搬运冲击或其他外力影响,因此,可以肯定,该遗址除靠边缘(尤其是东部边缘)局部有搬运现象外,其余绝大部分的地层堆积应该就是原生堆积。至于表层中多有一些汉代板瓦片、筒瓦片、砖块(包括商周时期的陶器片)等,当是历史演进到商周汉代时,古人仍然在这里生活劳动,他们为了居住而建筑房屋,后来房屋垮塌遗留所致。总之,从上述资料中显示出的种种原始信息表明,该遗址可能是一处远古时期古人类的石器制作露天(旷野)加工场。

6. 年代推测。首先,本年度的发掘虽说清理出了较多的石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打击和砸击的,既没有发现磨制石器,也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片),其他如用火、建筑、沟坑等遗迹都没有发现(可能发掘面积有限)。据此我们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可以考虑暂定在新石器时代以前。至于表层中发现的一些陶板瓦、筒瓦片、砖块以及零星商周时期的陶器(片)等,当是后来混入,与石制品加工场没有什么关系,更何况在 T8 中发现有汉代文化层和灰坑,当证明汉代这里仍有人类居住,为我们推测该遗址表层中发现的这些建筑遗物为汉代以后混入提供了佐证。其次,从河卵石及石制品所属的层位关系来看,该层底部有的是生土,有的是砂岩,其上为表土层和扰乱层,有的河卵石直接就裸露在外,故无法从地层叠压关系上获取年代证据。现唯一能判明该遗址年代的只有从石制品方面来突破了,从该遗址出土石制品数量之多,种类多样,有的石制品加工较先进等方面来分析,该遗址的年代可能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初期过渡阶段。这类遗址在三峡地区发现较多,如丰都和平村、老鹰嘴,奉节三沱、洋安渡、宝塔坪等都属于这类遗址。

7. 商周及汉代遗物。B 区 T3 第 3 层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但出土遗物不是很丰富,这主要是该遗址遭到长江洪水冲击所致。在 A 区也有零星发现,AT8③:9、AT8③:8、BT3③:26 平底器,其器形及陶质陶色与万州苏和坪中层(商周)、黄柏溪第二期(商周)出土的同类器相似,AT8③:7 圈足器与巫山双堰塘西周时期陶豆的圈足相似。商周时期陶器与汉代陶器无论是器形,还是陶质陶色区别明显,很好辨认,商周时期陶器多夹砂陶,陶色有红褐陶、褐陶、灰陶、黑皮陶等,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弦纹、菱格纹、划纹等。汉代陶器以泥质灰陶为大宗,轮制陶多,陶色有灰陶、灰褐陶、褐陶、黄褐陶、黄皮陶等。纹饰主要有绳纹,另有方格纹、弦纹、箍带纹等。除生活用具外,陶板瓦片、筒瓦片较多。陶器基本上都是轮制。本遗址中出土的这些陶器如盆、钵、壶、罐、圈足碗等与三峡地区秭归土地湾,巴东罗平,云阳李家坝、旧县坪,忠县中坝,丰都棺山坡、铺子河等遗址中都有发现,器物形态及陶质陶色纹饰基本一样。另发现的陶砖,这是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常见的建筑墓葬的墓砖,如石柱砖瓦溪墓地、万州大地嘴、松包岭、瓦子坪、柑子梁、天丘等墓地的东汉至六朝墓葬中都发现有这种陶(墓)砖。

长江流经长寿区的河段距离较短,长度约 20.9 公里。过去的几十年里,文物部门曾对长寿区长江沿岸地区开展过考古调查,但开展的次数很少,故发现的古文化遗存也只有零星几处,如 2009 年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记载长寿区长江沿岸地区仅三处先秦时期的古遗址,而这三处古遗址还是 1980 年重庆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的^[2],2007 年至 2010 年该区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共调查登录文物点 605 处^[3],但皆是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又从考古发掘工作方面来看,近 30 年来也只是 2008 年在巨梁沱村发掘过一次。清理出了一些商周时期文化遗物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另还发现有汉至六朝、唐宋时期墓葬。本年度调查与发掘资料不仅更加丰富了长寿区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研究内容,而且也使我们基本上弄清楚了当历史演进到了汉代时,三峡地区的古居民们仍然在这一地带活动,遗址和墓葬的分布更为密集,面积也在逐渐增大的一些重要历史信息。A 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远古人类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长寿地区首次发现的历史空白。虽说三峡地区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属于这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已发现多处,但像巨梁沱 A 区这样的遗址,堆积如此之厚、原料资源如此之丰富、石制品数量之多,这在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甚至在我国南方地区同时期考古发现中也是罕见的。总之,2017 年度巨梁沱遗址 A 区的考古发掘,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初期过渡的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高星,裴树文. 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M]. 巴蜀书社, 2010.

[2]重庆市博物馆. 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J]. 考古, 科学出版社, 1992(12).

[3]重庆市长寿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长寿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M]. 重庆出版社, 2013.